



## 诺奖得主的布衣与光环

今年的诺贝尔奖陆续揭晓。如果通往诺奖之路是难以预料的，诺奖得主之间是否存在一些共同的影响因素，能解释他们为何能获此成就？他们童年时生活在特权之下还是挑战之中？他们童年时期早熟吗……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如何获得诺奖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，但诺奖得主们成功的秘诀却各不相同。



《秘密：诺奖得主的布衣与光环》  
大卫·普莱特 著  
黑龙江教育出版社

## 我步步紧逼，其实于心不忍

《懂得》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、新闻评论员董倩入行二十余年“自传”式心灵履历的首度结集。书中收入大量系列深度访谈，董倩敏锐地发掘这些采访对象内心转瞬即逝的变化。这些珍贵片段的记录与思考，为读者展现出董倩很少展露的一面。



《懂得》  
董倩 著  
东方出版社

□大卫·普莱特

## 穷人才知穷滋味

和普通人一样，诺奖获奖者也深受童年经历的影响。但他们身上的共性很难概括，因为他们的家庭背景中并不存有一些共同点能预示他们的成功。诺奖得主通常都是专家、学者的子女，在拥有一定特权的中产家庭长大，但是也有例外。出身贫寒的人也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。马里奥·卡佩奇就是最好的例子。

卡佩奇，200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，孤身一人在战时意大利的街头度过了自己的童年。他在一次采访中描述了童年时期的一段经历：

我不是躲在被炸毁的房子里，就是躲在废弃的房子里。我们曾经待过的一栋房子其实是德国人拷问用刑的地方。进去之后，你能在地上看到各种割下来的身体零件，比如手指、鼻子、耳朵等，这些我都见过。那是在我5岁到8岁的时候。

马里奥第一次走进校园，但他不会读也不会写，甚至一句英语都不会说。他经常做噩梦，以至于把床单撕坏了，床也弄坏了。社区提供的情感支持帮他克服了创伤后的应激障碍。

很多获奖者的的确成长于窘迫的环境中，其中一个例子就是1957年的文学奖得主阿尔贝·加缪。加缪1913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，在他还不到1岁时，父亲就死于马恩河战役。家中很穷，但加缪的童年生活过得很开心，因为有学校里的一群朋友、他擅长的足球、海滩还有可以游泳的港口。

另一位童年时期饱尝生活艰辛，成年之后，生活依旧窘迫的诺奖得主是瑞典人哈里·马丁松，他在1974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，穷困贯穿了他整个青年时期。哈里1904年出生于瑞典南部，父亲是个酒鬼，在他6岁时因肺结核病故，母亲丢了他和6个姐妹只身前往美国谋生，这给哈里造成了严重的感情创伤。

另一位备受贫困折磨的诺奖得主是阿诺·彭齐亚斯：

穷人才知穷滋味。贫穷意味着你早上

睁眼起来就要去弄死浴缸里的蟑螂；意味着穿着那些令人嘲笑的旧衣服；意味着8月底才能吃上桃子……直到今天，我仍然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。贫穷现在还或多或少影响着我的生活。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努力来获得别人的接受和认可。

虽然通常情况下，诺奖得主都有特殊的背景，但显然出身贫寒并没有阻挡获得诺奖的可能性。

## 文化资本

出身于特殊的家庭背景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吗？

出身于学者家庭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。除了遗传的天赋之外，还有知识氛围、亲朋好友的激励以及父母在学术生涯上给予孩子的指导和帮助，所有这些因素都构成了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谓的“文化资本”。

A.罗滕贝格和G.怀舍克曾研究过诺贝尔科学奖和文学奖得主的家庭背景。他们发现很少有获奖者走上跟父亲一样的职业道路，但他们又得出结论说，父母经常对文学奖得主抱有“未完成的创作愿望”，而对科学奖得主怀有“未实现的创新和科学愿望”。

哈里特·朱克曼曾考察过1901—1976年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和一些普通科学家的家庭背景。她发现虽然28%的科学家出身于中上层阶级，但高达54%的科学奖得主也出身于同样的家庭背景。换言之，即使是在科学家之中，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也是社会精英阶层。

在这些共性之外也有很多特例。爱因斯坦的父亲是个电工；梅里德·科里根的父亲是个门窗清洁工；罗莎琳·雅洛的母亲读到了6年级，父亲只读到了4年级。

当家中有一个诺奖得主出现时，一种特殊的荣幸就会降临。伊雷娜·约里奥-居里的父母正是1903年的物理学奖获得者居里夫妇；居里夫人后来又在1911年获得了化学奖。英国物理学家JJ.汤姆孙在1906年获得了物理学奖，他的儿子G.P.汤姆孙在1937年也获此殊荣。尼尔斯·玻尔1922年获得了物理学奖，他的儿子1975年也获得了同样的奖项。威廉·亨

利·布拉格和儿子威廉·劳伦斯·布拉格在1915年共同获得了物理学奖。汉斯·冯·奥伊勒-切尔平拿到了1929年的化学奖，他的儿子乌尔夫·冯·奥伊勒拿到了1970年的物理学奖。卡尔·西格巴恩和儿子凯分别在1924年和1981年获得了物理学奖。瑞典经济学家贡纳尔·默达尔1974年获得了经济学奖，8年之后他的妻子阿尔瓦·默达尔因为在裁军方面做出的努力获得了和平奖。1983年的物理学奖得主苏布拉马尼安·钱德拉塞卡是1930年物理学奖得主卡特拉曼·拉曼的侄子。杰拉德·特·胡夫特获得了1999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，他的舅姥爷弗里茨·泽尔尼克获得了1953年的物理学奖。扬·廷贝亨是1969年的经济学奖得主，他的弟弟尼古拉斯是1973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。

## 失去父亲的孩子

我们无从得知有多少诺奖得主从小在缺乏关爱的环境中长大。但的确有少数获奖者是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长大的。米哈里·契克森米哈曾采访过91位非常有创造力的人物，其中包括几位诺奖获奖者。他发现，在他的样本中30%的男性在童年时期失去了父亲或母亲。

有两位诺奖得主的母亲拒绝跟他们的父亲结婚：马里奥·卡佩奇的母亲就是其中一位；另一位是1971年和平奖得主、德国政治家维利·勃兰特的母亲。至少有40位诺奖得主在11岁前失去了父亲。

亚历山大·索尔仁尼琴还没出生父亲就去世了。贝尔塔·冯·苏特纳和约翰·诺斯洛普也是遗腹子。很多人推测说，正是因为父亲的缺失或缺席激发他们获得了这样的成就。让-保罗·萨特年幼时父亲也去世了。萨特说，如果他还活着，“他肯定会毁了我。我很庆幸他年轻时就去世了”。或者我们也可以，这些获奖者的成功是对他们母亲能力和奉献的赞颂。

所以诺奖获奖者是这样一群人，有的人挺过了丧父之痛，活了下来；有的人跟父亲感情疏远，备受折磨；有的人跟父亲关系融洽，从中获益良多。

(摘自《秘密：诺奖得主的布衣与光环》)

□董倩

我采访了二十多年，这恐怕是唯一一次采访到半路我主动放弃的采访。

我的采访对象叫林茹，2016年10月刚过26岁的生日。2014年她被查出得了骨肉瘤，一种恶性肿瘤，会弥散到肺部，几乎不可逆。但是2016年年初她意外怀孕，尽管医生说怀孕会加速恶化病情，让癌细胞扩散，可是她仍旧没有终止孕育，直到第七个月时不得不早产剖宫生下一个女儿。生了女儿，她一边让人给孩子拍录像记录，一边给自己拍，说给女儿很多话，一年一个祝福，一直说到女儿18岁。她不想让自己用命换来的女儿根本不知道母亲长什么样。我很感兴趣，想跟这个年轻的母亲聊一聊她心里对爱情、孩子、生活、活着的想法。但是看其他平面媒体的报道，担心她现在的状况能不能接受长时间的采访。

想试试，还是去了。

从虹桥机场坐车一个小时左右到昆山的一个居民小区，林茹就住在这里。爬六楼的时候我在想，没电梯，她想下楼恐怕也是个难题。开门的是位50多岁的妇女，满脸是愁，南方乡下妇女的打扮，想必是她的妈妈。我问：“是阿姨吧？你女儿在哪儿？”她指指里面的一扇门，说：“在里面躺着。”

房子简陋得很，她妈妈说这是租住的房子，单元房，三间屋，地上连水泥都没铺，就是毛坯房的地面，三个房间的门都关着，中间的厅就很黑。进去就是一股扑面而来的压抑。

我在她母亲的引领下跟着进了一间屋，林茹就躺在床上。

这第一眼的印象太深了。一大床被子底下，几乎看不见人形，只露出一个脑袋，因为她太瘦。露出来的脸，也看不出美丑，看了只觉得心猛地一抽。她眼睛深陷，衬得颧骨特别高，两腮也塌了，又显出牙床，

眼睛半开半合，眉头紧皱，头发枯涩地散在枕头上，蜡色的皮肤包裹着一具骨架，看了让人害怕。

这种情况，能采访吗？

我到她床边坐下，轻轻地问：“身体觉得行吗？能说话吗？”她使劲抬起眉头，靠着这股劲儿把眼睛彻底睁开，看着我说她今天身体不大对劲儿，但是愿意配合着我把采访做完。我当时心里很矛盾：她是这么个情况，真不应该让她说话了；可是大老远来了，很想知道她心里的想法，不想这么轻易放弃。而且，看她这个样子我就更想知道：她的孩子才两个月，她自己也早就知道身体会变成这样，为什么还坚持要孩子呢？我狠了狠心，对她说：“这样吧，我们先开始，什么时候累了什么时候歇歇，你看行吗？”她点点头。

她母亲帮她垫垫高，上身能直起来一点。她坐起来，把一只胳膊拿出来，看出她也是打扮了，一件马海毛的白色套头毛衣，枕头边还放着一件红色呢子外衣，想是等着我们来采访时要穿的。

我想着一定要赶快，趁着她还能说话，一会儿怕是连话也说不了了。因为她真的是身体状况不好，眼睛转动一下仿佛都要牵着浑身的力气。

我没有从孩子开始问，而是从她和她丈夫怎么相识说起。我想了解他们的感情有多深。一个女人要怎样爱一个男人，才会搭上命给他生孩子。说到恋情，林茹枯萎的身体好像被水润湿，一下就来了神，她脸上竟然露出了笑，一点血肉都没有的脸上笑出了好多纹理。

我们的谈话也就刚刚开始了四五分钟，一阵剧烈的咳嗽开始了。她的脸憋得变形，看得出她没劲儿咳，她用了很大力气想抑制住，可是抑制不住，一股根本就不属于她的力量从她胸里涌上来，她先是细弱地叫了两声，然后就从身体很深的地

方发出“空空”的咳嗽声，一声接一声，她干巴的躯体被震动得快散架了。

我、两个摄影师、录音师、编导，我们五个人就在旁边看着，有点不知所措，那种情形，犹如一个人在死亡线上挣扎，我们就在她旁边，还记录着，却无能为力，大家都有点蒙了。

林茹妈妈却好像已经习以为常，她走过来抚摸了一下女儿的额头，把散乱的头发拨回去，跟我们说，前几天刚出院，有家电视台来把他们俩接出去拍婚纱照，连续折腾了两三天，她的身体状况恶化了，本来没这样咳的。说这番话，她没有怨气，只是发愁。

林茹妈妈的一句话直通通地戳在我面前，就在林茹身边，我心里问自己：记者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没错，林茹的故事是耐人寻味，也的确值得让大家去思考人为什么活着，可是用什么手段呢？就像那张新闻史上著名的照片：一只秃鹫站在一个比它大不了多少的因为饥饿而濒死的小黑孩身后，等待着下一秒扑过去。记者在那时，是应该记录，还是去救助？是一动不动地等待机会按下快门，还是应该过去把秃鹫轰走抱起孩子？林茹病成这个样子，有价值有意义去表达她为什么要为了一个新生命这样做，可是她气若游丝，又怎么能逼迫她去做推她去死的事？

我们摄制组都离开了林茹的房间。旁观一个病人的巨大痛苦，不是亲人、朋友，而是陌生人，就好像在粗暴地看一个人的裸体。我能感到林茹虽然病到如此，还是在极力维持着一个女人的体面，没有因为疼痛而不顾。她想保持好看，想给我们留下一个美好的形象。可是她已经形容枯槁，已经很不好看了。那一刻我做了决定，不拍了，不采访了，让她好好休息吧。

我们回了。我没有完成这次采访，有遗憾，但是我这么做也是对的。

(摘自《懂得》)